

李立夫
路红 主编

末代

溥仪在天津

皇帝

天津人民出版社

◎ 李立夫 路红 主编

末代

溥仪在天津

皇帝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末代皇帝溥仪在天津 / 李立夫, 路红主编. —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0.1
ISBN 978 - 7 - 201 - 06413 - 0

I. ①末… II. ①李… ②路… III. ①爱新觉罗·溥
仪(1906~1967) — 人物研究 — 文集 IV. ①K827 =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15799 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 刘晓津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部电话: (022) 23332469

网址: <http://www.tjrmcbs.com.cn>

电子信箱: tjrmcbs@126.com

高等教育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787 × 960 毫米 16 开本 22.5 印张 2 插页

字数: 380 千字 印数: 1 - 4,000

定 价: 39.80 元

编辑委员会

主 任	张绪明				
副 主 任	路 红	徐春范	李立夫		
编 委	赵继敏	冯 军	王庆祥	王文锋	
	吕冬雷	陈 宏	李 哲	肖 娴	
主 编	李立夫	路 红			
副 主 编	王庆祥	王文锋	冯 军		
图片编辑	张立宪				

序 一

长春市政协主席 張元富

长春是一座有着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独特历史文化影响的重要城市。在它几百年城市发展过程中,曾作为伪满洲国的“首都”长达14年,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世界上存续时间最长的伪政权的“都城”所在地,留下了特殊的城市印迹,形成了特有的城市历史和文化积淀,构成了长春的城市发展文脉和寓教励人的警示性文化资源。

尤其是近年来,随着清宫题材的影视和文学作品的大量涌现,以及电影《末代皇帝》在全世界的公映,国内外对溥仪的研究不断深入,新资料的不断发现,研究人员的不断增加,引发了社会对溥仪研究的关注和热望,利用溥仪研究成果开发创作的文艺作品也层出不穷,影响逐步扩大,已形成了跨国性的溥仪研究初端。

为了适应观众和国内外学者的需求,我们于2005年8月9日成立了长春溥仪研究会。该研究会是由长春市政协牵头,与伪满皇宫博物院、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吉林大学文学院、东北师范大学日本问题研究所等多位知名专家、学者共同发起的学术性社会团体。

在长春市成立溥仪研究会,开展溥仪专题研究,不仅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与条件,也具有更广泛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长春曾是伪满洲国的“首都”,殖民文化在长春的城市发展史上,刻有较深的烙印。因此,长春现存的伪满建筑在全国是最多的,也是最典型的。溥仪充当伪满洲国傀儡皇帝时的宫廷遗址在长春。伪满皇宫博物院作为研究、收藏和展示与溥仪相关的文物、资料的专门机构,更具有权威性与独特性。这是我们作好溥仪研究的地缘优势。

长春市政协文史委自1980年以来,组织学者进行了溥仪最后的资料遗产的整理。特别注重知情人亲历、亲见、亲闻等“三亲”史料的搜集整理,并以《长春

文史资料》为载体,从1982年第三期开始连载李玉琴女士的《坎坷三十年》。1984年2月以“专辑”形式在全国率先出版了溥仪遗孀李淑贤的回忆录《溥仪与我》,记录了溥仪成为公民后的社会活动、业务工作和家庭生活等经历,第一次向全世界传播了溥仪后半生的真实形象。此后又出版了《末代皇后和皇妃》一书,公开发行上百万册,全国各大媒体竞相登载,并拍摄成电影《火龙》、《末代皇后》,在国内外公映。1985年以后,《长春文史资料》又陆续刊布了《溥仪在东京法庭》、《伪帝宫内幕》、《淑妃传》、《伴驾生涯》等著作。在海峡两岸影响较大的《溥仪后半生》和《李玉琴自述》等著作,也是市政协委员与文史委合力完成的。这些都成为电影《末代皇帝》和28集同名电视剧的创作源泉。伪满皇宫博物院举办的《从皇帝到公民》展览,获得了“第六届全国博物馆十大精品陈列展览精品奖”,并应邀在国内外流动展出,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反响。同时,还编辑出版了《从皇帝到公民》(画册)、《伪满宫廷秘录》、《中国人眼中的溥仪》、《溥仪传略》等书籍,他们还利用溥仪众多资源开发出与溥仪等相关的反映当时历史阶段的产品,这是我们深化溥仪研究和研究成果转化和输出方面所作的可喜的探索 and 尝试,充分发挥了资源优势。

长春市拥有一批从事溥仪问题研究的知名专家学者,这些专家学者除了自身掌握资料、专门研究外,还得到了日本、俄罗斯、美国、意大利等国家和地区致力于溥仪研究的专家和学者的热情参与,壮大了溥仪研究的队伍,具有特殊的人才荟萃优势。

长春溥仪研究会成立后,先后举办了两届“溥仪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第一届溥仪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于2006年9月5—6日在伪满皇宫博物院举行,它是溥仪研究的一个良好开端,既扩大了学会影响,又取得良好的社会效应和国际效应,并出版了第一部学术成果。由长春溥仪研究会主办、天津市历史风貌建筑整理有限责任公司承办的“第二届溥仪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于2008年6月28日在天津市举行。此次讨论会论题重点集中在溥仪在天津七年的复辟活动和生活经历,可谓是溥仪研究“天津版”的开拓篇和汇集篇,对这一有价值的历史脉络发掘资料,深入研讨,出版著作便是这次学术讨论会的最大突破。其论文无论从历史研究、人性角度还是从时代意义上讲,都堪称为创新之作,从而使溥仪研究突破了原有定式,提出了溥仪研究的新视角,展现了新的活力。

自2005年8月到2009年10月,长春溥仪研究会已走过了四年多不同寻常的岁月。从溥仪研究会的筹备到溥仪研究会的诞生,从“第一届溥仪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的成功召开到第一部学术成果《漂泊沉浮多少事——解读溥仪》一书的问世,从“第二届溥仪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的隆重举行到溥仪研究成果的成功转化与利用,从溥仪研究的资金筹措到长春溥仪研究会第一个连续出版物《溥仪研究》的申办……长春溥仪研究会在理事会的领导和国内外会员的共同

努力下,得到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现已拥有国内外会员 100 余人,其中包括国内相关省市及国际上几个国家的资深专家、学者,这其中凝聚着长春市政协几届领导的心血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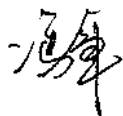
长春溥仪研究会的成立和取得的研究成果,不仅弥补了这段历史的空白,而且为国内外学者搭建了交流学术、切磋观点的平台;不但丰富了地方史和近现代史史料,还拓展了人民政协的工作领域;对长春的文化遗产保护、旅游资源整合等工作具有新的启发和推动。长春溥仪研究会丰富的研究成果,促进了东北亚文明史及中国近代史的完善。借助这个平台,进一步加强长春与国内外的联系与沟通,增强长春历史厚重感,提升其学术地位,扩大长春市对外影响,以达到以史为鉴,维护和平,面向未来,共同发展之目的,对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发展我国的文化旅游事业,促进文化大繁荣和多样化作出贡献。

值此硕果累累的己丑年收获之秋,长春溥仪研究会的第二部学术成果即将出版面世,在此,我表示衷心地祝贺!同时也由衷地祝愿长春溥仪研究会越办越好,为我国的文化繁荣作出新的贡献。

2009 年 10 月 9 日

序 二

天津市历史风貌建筑整理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首先要庆祝长春溥仪研究会主办、天津市历史风貌建筑整理有限责任公司承办的“第二届溥仪研究国际讨论会”在天津顺利召开。来自世界各地的10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大会,使得有关溥仪的近代史研究又更进一步。特别是加深了对于溥仪在天津的这一段历史的研究,研究了溥仪与近代天津的政治关联、对近代天津时局与社会的影响,同时也深入挖掘了溥仪旧居静园的历史文化资源,展示了天津历史风貌建筑修复和人文资源的整合结果。我也借此次大会的研究成果出版面世之际,再次向支持天津历史风貌建筑保护工作的各级领导和部门、文化界、新闻媒体朋友以及广大市民表示衷心的感谢。

天津是国务院批准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遗产十分丰富。在众多历史文化遗产中,集中反映天津近现代城市发展历史,融东、西方文化传统特点的街区和建筑,构成了天津特有的城市风貌,是天津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建设国际化大都市不可缺少的文化历史内涵。

天津素有万国建筑博览会之称,毛泽东同志说过“北京四合院,天津小洋楼”。在近代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的社会背景下,天津被迫开埠,九国列强设立了租界,也带来了世界各地风格迥异的各式建筑。天津每一幢小洋楼都记载着一段历史,都映射着近代中国的一个阶层,是时代变迁的见证。

为了将城市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融入城市整体发展,再现天津城市历史的特殊魅力,展现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风采,近年来,天津市委、市政府作出打造“近代中国看天津”文化旅游品牌的战略决策,重点整理建设一批反映天津政治、经济、文化、建筑为主的历史风貌建筑和街区。

天津市历史风貌建筑整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风貌整理公司)作为天津市政府唯一特设的对历史风貌建筑进行腾迁、整理、经营的国有独资公司,自2005年10月成立以来,即深知责任重大,一直秉承使命、激情、变革、奉献的理

念,力求用深邃的目光、缜密的思维和创新的精神,传承建筑与文化沿革的机理,体现历史风貌建筑在现代社会应有的价值,展示天津作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的风采。

风貌整理公司成立后立即投入到溥仪旧居——津城静园的腾迁整修的工作当中。静园是天津市特殊保护级别的历史风貌建筑和文物保护单位,位于和平区鞍山道70号,始建于1921年,占地面积3016平方米,建筑面积约1900平方米。1929—1931年,末代皇帝溥仪携皇后婉容、淑妃文绣在此居住。之后,静园几易其主,历经变迁,到本世纪初,静园已变为45户居民伙住的大杂院。

2005年10月依照《天津市历史风貌建筑保护条例》,风貌整理公司对静园进行了保护性腾迁和整理。2007年7月20日,历经600天腾迁整理后的静园,作为国家AAA级旅游景区向公众开放,完整地展示了80年前的建筑风采,成为了全国第一幢依据地方立法腾迁、整理完成并向社会开放的历史风貌建筑。

静园自对外开放以来,先后获得“中国旅游品牌魅力景区”、天津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天津市科普教育基地等荣誉称号,成为了集建筑复原、人文旅游、商务办公多位一体的特色历史风貌建筑,成为展示天津历史风貌建筑保护利用成果和人文旅游景观的新亮点。

2008年,风貌整理公司与长春溥仪研究会合作举办“第二届溥仪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此次“溥仪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的主题,是以研究溥仪在天津7年的复辟活动和生活经历为主,旨在更好地交流溥仪研究的学术成果,展示天津历史风貌建筑修复和人文资源整合的成果,发掘和丰富静园历史人文资源,填补溥仪在天津这段历史研究的空白以及溥仪研究的弱势领域和空白领域,以提高溥仪研究会的学术地位和社会地位。同时号召社会各界人士及广大溥仪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积极参与到天津历史风貌建筑保护事业中来,为提升天津城市历史文化品位,打造“近代中国看天津”文化旅游品牌,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作为风貌整理公司第一幢腾迁、整理的历史风貌建筑,静园的整理经验将对天津历史风貌建筑的保护和利用产生深远的影响。下一步,我们将在完善静园旅游配套设施,举办好系列专题活动的同时,完成市委、市政府关于历史风貌建筑的整理规划,充分发挥历史风貌建筑在当代社会应有的价值。

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历史的瑰宝、城市的财富,将在天津新一轮的巨大发展中发挥其不可限量的作用,并将让世界瞩目!

2009年10月

七 载 史 训

溥仪在天津的7年,特别是他在静园生活的几年,是他人生思想已经成熟,而且行动可以自由的年代。也就是他可以自己思考,自己决定,自己说,自己做的年代。尽管当年他的思想主旨是要实现清朝复辟,是要挽回在他手上失去的国家政权,因此也做过许多错误的决策,甚至相信日本军阀,陷入他们为侵略中国而摆设的各种阴谋,由此而在张园和静园留下了一些错误、甚至罪恶的记录。然而,这都是一页页与国家和民族息息相关的历史,是能够见证许多重要事实真相的历史,是不可以忘记的。

一、溥仪来到天津寓居7年的原因

溥仪为什么来到天津?其实是要以天津为过渡,实现出国留学的夙愿,为此,甚至早在出宫两年前,溥仪就急于放弃他的“无用而繁重的私产”。他要趁着年轻,“轻装”走向世界。他要到英国去留学,以现代知识充实自己,适应当代社会的需要,通过一条新的道路,去寻回祖宗的江山。

溥仪能有这些思想,是受到庄士敦的影响。庄士敦认为,把一个孩子关在监狱一般的皇宫里,没有新鲜空气和充分的活动,只有极端矫情造作的所谓皇帝生活,对他的健康、身体、知识和精神都有害,是残忍的。他主张“与其使他的身心健康受到损害,宁可牺牲掉一切东西”,应该放弃空头“尊号”。这些教育,很快就把一个十六七岁的孩子给鼓动起来了。

为了实现留学之梦,溥仪身边几位有影响的谋臣提出了各自的主张:庄士敦主张移居英使馆,然后赴英留学;郑孝胥和罗振玉主张移居日使馆,借以前往日本留学。主张“皇帝出洋”的遗老中还有金梁,这位曾经的张学良的老师,曾在1924年当过逊清内务府大臣的遗老,奏请溥仪从速“密赴天津”。在这份颇为迎

合溥仪心理的折子后面还附有遗老们的分工名单,让庄士敦、罗振玉等随侍出洋,郑孝胥全权处理善后并与民国政府交涉相关事宜,而以载沣和陈宝琛等办理北京皇族事项。

溥仪本人则最希望先往英国留学,来津前夕还曾派庄士敦前往英国公使馆联系。据英国《伦敦每日新闻》记者凡尔农·麦克尼兹报道,溥仪“要求去访问大英帝国”,他最想会见瓦利斯王子,还愿与乔治·劳合(美国首相)、查理·卓别林(电影演员)、胡佛(美国总统)和林白尼(当时名噪一时之德国飞行员)等人会晤。然而,庄士敦与英国公使交谈后告知,英国政府变卦了,对于接纳溥仪已无兴趣。溥仪这才采用罗振玉的建议,不论将来赴英还是赴日,先到天津再说。因为当时天津的殖民地色彩非常突出,“遗老”文化独树一帜,当年落魄的前总统、前总理,失意的督军、省长等高官政客和军阀头领们,大多把天津外国租界地作为最佳避风港,携家人、财宝在此落脚,寻求“洋保护”。溥仪也是这样的心态,认为这里华洋杂处、中西交融,“遗老”、“遗少”很多,退可安逸享受、静观时局,进可从容举事、一呼百应,有助于实现他复辟大清的愿望。

那么,日本政府的 attitude 呢?溥仪要出洋东渡、赴日留学,自1925年1月上、中旬起,遗老罗振玉、万绳栻与日人狩野、后藤、芳泽谦吉等就在积极活动,安排溥仪东渡日本事宜。到2月间,溥仪派员赴日,先后商借西园寺公望的私邸清风庄和山县有朋公爵的私邸梦林挖庵,均不成。又经京都帝国大学教授狩野、矢野西博士斡旋,亦未获日本当局认可,以致东渡计划搁浅。

1925年3月7日《京报》报道了相关的消息:“溥仪夫妇的出洋问题迟迟未获解决,原因在日本方面无法确定对待他们的礼格。”此事发生在1925年3月3日,在日本上院有人“质问溥仪待遇问题”,日本外相币原宣称,如果溥仪来日,固当郑重礼遇,“但按接待帝王办法殊感困难”。其实这是因为北京政府有明确的态度:“3月9日,段祺瑞执政回答电通社记者问时说,对溥仪以个人资格赴日、游历欧美或久留日本,均不加束缚。”换一句话说,溥仪只能“以个人资格”行动,这显然不是他愿意接受的。

很明显,溥仪的留学之梦最终没能实现,其重要原因是溥仪想去之国的政府在当时不愿接纳,认为溥仪已经没有使用价值了。凡尔农·麦克尼兹在《被放逐的皇帝》一文谈到溥仪时说:“目前他在世界上已无任何重要价值。看起来,也永远不会再有那样煊赫的一天了。”

溥仪的留学之梦最终没能实现,既有政治上的阻力,也有经济上的原因。溥仪被驱逐出紫禁城以后,已经失去了每年400万元的“优待岁费”,没有收入了。只靠出售珍宝、遗老进贡,勉强度日,有时连侍从人员的工资都要拖欠。而出国

留学则需要一大笔资金,经济上的实力也是不可缺少的。

溥仪东渡搁浅的另一个原因是载沣坚决反对。1925年3月6日,载沣特遣载洵和载涛赴津劝阻溥仪东渡,“以断谣传”,同时载沣还亲笔致信溥仪,劝阻东渡并注意安全,勿出“租界”:“善后诸事自由各该王大臣等协商办理,并请皇帝在日界常驻,不可往游他界为要,甚为系念。”3月11日,载沣和荣源又亲自赴津,会见溥仪后还拜会了日本驻津领事及驻屯军司令,仍为劝阻溥仪东渡。3月14日,在张园“御前会议”上,讨论东渡问题时发生意见分歧,溥仪倾向赴日,载沣反对,当场表明了反对溥仪东渡的态度。毕竟载沣是溥仪生身之父,他怎么也要有所考虑。

如果说溥仪东渡搁浅还有其他原因,那就是溥仪留在天津,感受到一定限度内的自由,这让他在这段时间内有所满足,逐渐成为定居之势。英国《伦敦每日新闻》记者凡尔农·麦克尼兹在《被放逐的皇帝》一文中形象地写出了溥仪和婉容的自由生活:

溥仪在天津再没有高高的官墙障眼了,他接触了街市的喧闹,感到很新鲜,经常独自上街,或带着婉容和文绣,逛珠宝店、百货店、服装店和餐馆,喜欢什么便流水般地花钱……

这时的婉容虽已失去皇后身份,却正过着一生中最快乐的平民生活。正如当年的欧美记者不厌其烦报道过的,溥仪和婉容时常一起出来溜冰、看跑马、参加跳舞比赛、乘汽车在租界内购物或游玩等等,把日子打发得轻松愉快。这两个人也很快成为天津的风云人物。

天津7年,是溥仪和婉容从思想到行动相对自由的时代。当然,凡尔农·麦克尼兹也记录下了溥仪和婉容的天津生活中不甚愉快的一面,然而,这恰恰能够证明,他们的自由生活已经接近打破最后一层、也是没有办法不遇上的“约束”:“陈宝琛和胡嗣瑗等人对溥仪挥霍浪费虽不过问,却坚决反对他私自上街游逛,认为有失皇帝尊严,且不安全。”《我的前半生》中曾谈到胡嗣瑗在开明戏院的包厢里看见了溥仪和婉容,后来又听说溥仪曾到中原公司理发,这两件事儿,当时他都上奏引咎辞职。溥仪则在1927年4月27日发出手谕,对胡嗣瑗褒赏有加,“著赏给貂皮一件,以旌忠直”(参见《清废帝溥仪档案》卷73,原件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此后溥仪再也不敢带婉容看戏去了。

也还会有必须“回避躲是非”的事儿。据伍德黑德讲,溥仪和婉容每年一度观看苏格兰圣·安德烈侨民协会的足球赛,有一次球赛组织者发现军阀张作霖之子也来看球。两个重要人物——溥仪和张学良不期而遇,出于礼节上的考虑,组织者决定把他们安排在不同的时间入场,以回避是非。在这种情况下,溥仪是

不可能完全自由的。

事实上，溥仪在天津寓居7年一直都在寻找出洋的机会，但一直都没有找到，或许是为了降而求其次，最后得到了一个“重返满洲”的“机会”，这让他觉得绝不可以“放弃”。于是他“离津出关”，结果却失去了他在天津已经获得的全部自由。

二、溥仪在天津的活动

天津的7年，对溥仪来说，正是从纲领到实践复辟清朝充分表演的时期。概括说来，他主要做了以下几件大事：

（一）成立清室驻天津“行在”办事处

1925年3月8日溥仪“传谕”，成立“行在”，下设总务、收支、交涉和庶务等四个处，溥仪也曾自己的小天地里立法，即所谓《行在办事处暂行章程》，规定“行在”办事人员“受命于师傅”，请安人员是否召见“由师傅请旨”，外来文件或封奏“由师傅……检看，查无悖谬始呈”，需要预筹或应变通的重要事项“由师傅主议集各员会商决议”，遇有与民国或外国交涉事项“须俟集会议决办法，由师傅请旨拣员前往接洽”。溥仪把大权交给“师傅”了。此时，师傅还有三位，朱益藩常驻北京而在1925年4月成立的“景山清室办事处”列名管事，庄士敦不久就离开溥仪，能在天津“行在”主事的师傅只有陈宝琛了。他并不列名，仅以“皇帝师傅”的资望占据崇高地位，发挥权威作用。

陈宝琛年近八旬却毫不懈怠，据《召见日记簿》载，溥仪和陈师傅每月至少有一半以上的日子是要在张园见面的。陈宝琛的亲属、子女也陆续走进了“行在”的圈子。继其外甥刘骥业在“行在”任职后，两个儿子陈懋需和陈懋随的名字，首次出现在1926年3月8日的《召见日记簿》上。

（二）溥仪所做的第一步工作——打出“复号还宫”的旗帜

溥仪出宫后回到父亲家里，当陈宝琛带着段祺瑞的电报来到醇王府时，郑孝胥已领着日本公使馆的人来实行他们的计划了。陈宝琛坚决反对，既不同意让外国人领养溥仪，也不愿意让溥仪放弃帝王尊号甘当平民，他就是这时最早提出“复号还宫”口号的，其内含是以段祺瑞的态度和各国驻华公使馆的支持为依托，力争恢复皇帝尊号和原优待条件，返回紫禁城，再徐图复辟大清的“伟业”。他的想法得到载沣等王公大臣的赞同，“复号还宫”就此成为载沣、陈宝琛等人的政治目标。溥仪到天津以后，陈宝琛、载沣等仍然认为，此时此刻应该走出的

第一步还是“复号还宫”，而不是“出洋”或“东渡”。

溥仪得到两次机遇，即被认为是以实现“复号还宫”政治目标的机会。

第一次机遇出现在1925年3月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逝世之际。1925年3月14日，清朝遗老在张园举行“御前会议”，再度讨论东渡问题。刚从北京“微服”来津的载沣，与陈宝琛一起坚决反对溥仪赴日，其理由是：（1）趁着孙中山逝世的机会向政府交涉恢复优待条件事宜。（2）前此已向平政院就取消优待条件一事提起了诉讼，该院正讨论中，应该等待结论。（3）为体面计，溥仪出洋川资不能不向民国政府追索。（4）天津“租界”很安全，无妨蛰伏一时再作打算。几天前载沣还就“皇帝有出洋之说”致信溥仪，表示“总以在津不动为宜”。这实际就是“复号还宫”的路子。

这时已经抵达天津“觐见天颜”的康有为，先以进德修业、亲贤远佞谏言，随即致电当时控制北京政府的吴佩孚、张作霖和张宗昌等军阀首领，要求恢复清室优待条件，“以昭万国之大信”。电文先说清朝统治中国200余年的好处，“政行泽被，吏士奉法，盗贼鲜少，民生乐业，赋敛最薄”；继说清帝逊位有大功，“夫中华之为民国，以清朝让之，非民国自得之也”，所以才有优待清室之条件；再说冯玉祥“毁法破约，逼帝搜宫”，大加斥责。在电文的最后一段里，康有为大声疾呼提出了要求：恢复皇帝尊号，迎请宣统还宫。此即“复号还宫”的先声，其正式提法就是“恢复皇室优待条件”。康有为迈出这一步，也是为了最后实现他那个“虚君共和”的政治理想。

第二次机遇发生在1926年4月，中华民国临时执政段祺瑞通电下野，当时出现了直系军阀吴佩孚和奉系军阀张作霖上台执政、联合控制北京政权的政治大气候。在陈宝琛和朱益藩看来，“此际紧要关头，自应大众出全力以赴事机，未可大意”。东渡缓议、天津暂安的方针既定，陈、朱要赴的“事机”，当然就是指“复号还宫”了。其时，陈宝琛通过与北京清室办事处之间的书信、电报、电话和人员往来，遥控关于恢复优待条件的交涉。

1926年5月26日，管理北京清室办事处的朱益藩，给陈宝琛写来一封长信。从中看出，溥仪与民国政府就恢复优待条件而进行的谈判，由陈宝琛牵头已经开始。遵照他的指示，朱益藩“振笔疾书，意在详明”地拟就一篇书面声明，正在征求原清朝摄政王载沣、原清朝海军部大臣兼弼德院顾问大臣载洵、原清朝军咨大臣载涛、原清朝外务部尚书兼参与政务大臣吕海寰、原清朝陕甘总督升允、原清朝新疆巡抚袁大化、原清朝湖北布政使王乃徵、原清朝江宁将军铁良、原清朝邮传部左参议陈毅等王公遗老签名。

综上所述，溥仪、陈宝琛、胡嗣瑗等为了恢复袁世凯所立的《清室优待条件》

并废弃冯玉祥修改优待条件后成立的“清室善后委员会”，不仅抓住了吴佩孚和张作霖上台执政的政治大气候，还在选派代表以及谈判策略等方面动了许多脑筋。而且，与陈宝琛的谈判遥相呼应的，还有康有为的呐喊，由他代表的复辟派把“复号还宫”的黄龙旗又扯到社会上去了，从而形成一股不大不小的反动逆流。尽管如此，这一切不久便成了泡影。

（三）为实现政治目标，溥仪四处联络

溥仪并不愿意无期限的“静观待变”，早在清宫里的时候就不大安分，惦记着出洋，出宫以后对“复号还宫”也不甚感兴趣，他的愿望是在全国范围内重建清朝政权。为此他想方设法联络军阀，以便利用他们的武装力量，这从他刚到天津时就开始了。陈宝琛既不能完全制止这种倾向的发展，又不愿意放任自流，乃插手其间，尽量对溥仪施加影响。

1925年4月，溥仪开始利用刘凤池游说东北将领，先后认识了胡毓坤、马占山、毕翰章等。

1925年5月7日，张宗昌出任山东督办，溥仪派恒煦携其亲笔信往见，并与直隶督办褚玉璞会晤。张宗昌出任直鲁联军司令以后，溥仪不惜花费金钱和宝物，一再给他提供财力上的支持。直到1928年初张宗昌于蒋介石、张学良夹击之下兵败滦河，溥仪才逐渐放弃他。

1925年6月，张作霖派亲信阎泽溥前往张园向溥仪进奉银币10万元，并邀请溥仪在曹家花园他的“行馆”相见，溥仪去见后张作霖口称“皇上”，跪地磕头，颇为动情。张作霖虽然尊崇溥仪，但他最终是为自己，不会甘心在“宣统皇帝”脚下称臣。溥仪也看清了这一点，而对大帅的圆滑态度保持着戒心，以大量古玩和现款直接笼络张作霖的部将，如张宗昌、许兰洲、李景林、马占山、胡毓坤、毕翰章、荣臻等。

1926年6月9日，溥仪召见张作霖部属、历任黑龙江军务帮办和奉军副司令等职的许兰洲。此人1927年出任国军大元帅府侍从武官长。

1926年6月29日，溥仪致书毕翰章，表示愿见他和胡毓坤，次日两人即来“觐见”。溥仪随即致书胡毓坤，给予鼓励，据称两人初见，谈话坦诚。

1926年9月12日，溥仪接见毕庶澄及其内眷、旅长常之英、毕翰章和张宗昌。毕庶澄是奉系军阀张宗昌部军长兼渤海舰队司令，1926年前后常往张园“觐见”溥仪，溥仪称呼他“将军”。溥仪还曾携随侍李国雄“回访”毕庶澄。溥仪在7月2日召见他时赏给葡萄电灯一件，8月1日溥仪又有亲笔信致毕庶澄，并赠送军刀一柄。

1926年9月，溥仪命人转告将往南京的吴忠本，慰问正在湖北与北伐军作

战而连连失利的北洋军阀直系首领吴佩孚。不久武昌沦陷，继而北伐军又在河南境内连连告捷，吴佩孚部溃败。

1926年10月，溥仪接见白俄罗斯军官谢米诺夫，赏赐5万元，资助其实行“夺取满蒙地区，建立反赤根据地，由溥仪就位统治”的“犯难举事、反赤复国”计划。谢米诺夫对溥仪表示“矢忠清室”，支持溥仪的复辟活动。谢米诺夫初往张园拜见溥仪时，陈宝琛持挡驾态度，曾上书指陈利害，愿“皇上”慎处。然而，溥仪接受郑孝胥“用客卿”的计划，支持张宗昌与谢米诺夫交往，1927年4月2日张宗昌兵败滦河后潜往旅顺，与谢米诺夫签订了《中俄讨赤军事协定》。

1927年1月7日，溥仪接见辛亥革命前后历任清朝武官、广西提督、广西副都督、都督、巡阅使、广西全省善后总办等职的广西地方军阀陆荣廷。

1927年1月11日溥仪接见苏锡麟、万绳武。苏锡麟生于1880年，字玉书，河北宁河人，历任世界红十字会中华总会会长、定武军统领、陆军中将记名提督、蓟榆镇守使，也是地方军阀。

1927年2月24日，溥仪接见王怀庆、白荫奎。王怀庆（1876—1953年），字懋宣，河北宁晋人，早年为袁世凯部将，1920年7月出任京畿卫戍总司令，在逊清年代与溥仪联系最多。1924年10月被吴佩孚委为陆军检阅使兼西北边防督办，1926年4月吴佩孚又委他为北京卫戍总司令，同年11月因奉系排挤而辞去本兼各职，寓居天津。

1928年6月4日，张作霖被害，同年8月4日张学良宣布为父发丧。溥仪闻迅命师傅陈宝琛和朱益藩给少帅写了一封慰问信，并送去“御笔”挽幛。张学良以东三省保安总司令的身份，于8月24日亲笔签名给陈宝琛和朱益藩复信致谢。此后溥仪继续与张学良交往，张学良劝溥仪脱袍子，辞老臣，“真正做个平民”，到英国读书。还曾经发生过溥杰随张学良部下私自出走之事，被溥仪迫令折回天津，并加以训斥。从根本上说溥仪与张作霖父子是对立的，他容不得别人当“满蒙王”，更容不得别人争帝位。

1929年3月6日，溥仪接见安福系小政客费毓楷。此人也经常用“策动复辟”来作为混入张园的门票。

1929年张学良“易帜”前后，溥仪利用与奉系将领广有联系的东北“卅”字会名人、原清朝翰林院编修商衍瀛说项，与少帅张学良密商，接触张作相、张景惠等人，向他们送礼，诡秘地从事政治活动，在“易帜”前后关键时刻，少帅还以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身份，写一封亲笔签名信“敬呈清帝尊展”。

溥仪与历届民国总统、总理等国家元首或执政一类人物，如寓居天津的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都有各种联系。如溥仪过生日，徐世昌照旧送礼，或以清朝遗

臣身份,时而又像退位总统对待一个政治际遇差不多的退位皇帝。下野后住在天津日租界须磨街的段祺瑞,也曾和溥仪在位于英租界戈登路的载沣家里,以反对蒋介石为旗号会晤。

一直住在日本租界区内的溥仪,与美、英、法、意、德等国租界内领事或驻军司令官,也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1926年2月25日,即农历丙寅年的“万寿节”,英国驻津领事馆的高级官员到张园祝寿。1926年5月13日,溥仪召见天津美国驻屯军司令官康诺尔并赠送相片两张。1926年5月14日,溥仪召见天津法国驻屯军司令官恩琪若。溥仪曾出席英皇加冕纪念的庆贺宴会,曾参观最新式的英国飞机。1929年3月6日溥仪接见英国司令希资、英国武官贝。

从日本驻天津驻屯军司令官高田丰树开始,历任驻屯军司令官都和溥仪常来常往;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吉田茂、副领事白井康以及陆续继任的总领事等也都是溥仪“行在”的常客。

婉容也参与了联络中外的政治活动,当年在溥仪身上下注最大的日本人,同样也在婉容身上下了注。在溥仪的《召见人名簿》上,在日本驻津总领事馆的宴请名单上,双方的人都经常成为对方的座上宾。在密切的政治交往中,婉容不仅作为历届日本总领事之夫人的朋友出现,也不断应酬总领事们五花八门的邀请。婉容与日本各界人士、名人眷属、记者等也有往来。值得一提的是,来自日本设在辽东的机构——关东厅的贡品,进贡人为曾任日本第四次伊藤内阁陆军大臣和满洲军总参谋长儿玉源太郎大将的眷属儿玉泽子,她在向“宣统皇后”恭请“懿安”的信中写到:“宸游沾上、坐看云起之时,远处辽东敬进御持之伞,区区粗品,伏乞赐收是幸,恭请懿安。儿玉泽子拜上。”(引自《清废帝溥仪档案》卷269,原件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在婉容联系的外籍人士中,除了日本人就属英国人了,英国皇室与婉容的交往颇有趣味。1926年6月3日中午12时15分至1时15分,在天津俱乐部为英皇室乔治五世寿辰举行庆祝会,会议主持者曾在事前专函邀请“宣统帝后”临席(参见《清废帝溥仪档案》卷112,原件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事隔三个月,乔治四太子因公路过天津,又通过张园的一位老朋友——记者赫·伍德海德,给溥仪和婉容寄了一份邀请信来(参见《清废帝溥仪档案》卷126,原件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对于身在租界又曾具有中国皇后身份的婉容来说,实在有太多的机会可与颇具身份的各界人士交往,例如,法国驻津军队总司令恩琪若曾邀请“大清皇后”与“大清皇帝”一起,参观在法国公园举行的“战胜纪念典礼”,当然是为显示他们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的国威;意大利驻津总领事派格尼自1928年6